

中国

现代社会转型研究

主编 陈国庆 陈勇

ZHONGGUOXIANDASHIHEHUI
ZHUANXING YANJIU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研究

主 编 陈国庆 陈 勇

副主编 田兵权 王元琪

陕 西 出 版 集 团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研究 / 陈国庆, 陈勇主编.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4-09041-3

I. 中… II. ①陈…②陈… III. 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现代 IV. 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4057 号

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研究

主 编 陈国庆 陈 勇

副 主 编 田兵权 王元琪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铁一局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6 开 27.75 印张 2 插页

字 数 461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224-09041-3

定 价 45.00 元

序

社会转型是一种社会质变，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发生整体性变革，包括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变迁等方面。其实质是传统体制获取现代功能，传统获得现代性的变迁过程。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肇始于晚清，在外来军事压力和战败屈辱感的刺激下，人们将整军经武放在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中国传统社会步入了以军事近代化为先导的社会大转型之路”^①。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开始了近代化的转型过程，其间经历了被动开放、经济起步、政体变革、思想解放等四个阶段^②。毫无疑问，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在晚清并没有彻底完成。民国时期，这种社会变迁仍在延续，并且在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皆取得较大的进展和深化。

我们赞同这样的观点：近代中国（1840—1949）既表现为从传统农业国向近代工业国的转型（在此过程中，传统政治体系向近代政治体系演化的民主化趋势、社会经济演变的市场化趋势、国家与社会结合的一元结构分解并呈现二元化发展趋势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③，但又无法完成这一转型，始终处于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渡状态之中。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大特征。那么，造成中国陷入这种境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不过归结起来，无非是内因论和外因论两说。

① 熊志勇：《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② 陈国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刍议》，《华夏文化》2001年第2期。

③ 参阅刘伟：《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趋势及其特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从外因论的角度来说，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不平等条约的束缚等是造成近代中国难以完成社会转型的主要原因。不过从世界史看，处于同样边缘地位的国家，有的可以通过改革而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近代化（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而有的则始终不能完成这一转型（如清政府与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可见，外因虽能影响转型的进程，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外因不能提供社会转型所需要的种种社会经济条件，也无法从根本上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而这些条件必须通过中国自身的变革才能创造出来，否则，就难以挣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难以改变外国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力量的控制。

从内因论的角度来看，文化延误与制度延误是造成近代社会转型难以彻底完成的关键所在。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与制度是两种互为因果的制约因素：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高度牢固性和封闭性造成了近代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挑战的迟钝反应；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借助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强化，中国传统文化才日益表现出保守与封闭的特征。应该说，两种因素都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产生了不利影响。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主要通过对人的心理、思想的影响来约束人，指导人。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发展中形成了具有极高内部结构的稳定性，同时也奠定了传统“夷夏大防”、“祖宗成法”等观念。近代国门被打开以后，正是在这些观念的支配下，清王朝没有迅速作出反应，甚至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也对西方文化表示排拒态度。可见，传统文化观念造成了近代社会转型起步的艰难，造成社会转型中的新旧文化冲突。制度具有强制性、人为性，主要通过为社会提供规范来控制社会，所以制度具有整合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新旧文化冲突的调解融会，各种社会力量的协调与吸纳，社会稳定机制的建立与完善，都可以通过制度机制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是社会转型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近代中国的制度延误，主要表现为传统政治体制的僵化和改革的滞后，致使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难以自上而下地在传统资源基础上渐进完成，相反却在政府与民众中造成裂痕，在传统与现代中造成断裂。旧

结构难以在渐进过程中逐渐转换而延续下来,新结构亦难以获得良好的社会环境而充分发展。诚如黄仁宇所说,中国传统社会晚期“潜水艇夹肉面包”式的结构(上下两片面包分别代表了文官集团和基层的普通民众。两片面包的维系靠尊卑、男女、老幼这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来维持,而它们都和经济、法治以及人权毫无关联),造成了近代以来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在传统社会里,政府和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之序,依靠科举制度为基础。1905年科考停试,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之间的联系更为脱节;民国初期,新的社会力量还比较柔弱,于是私人军事势力割据一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虽有一个高层机构,但全靠城市经济维持;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和边区,就创造了一个新的农村低层机构,不过仍然缺乏和高层机构之间的制度性联系^①。诸如此类问题在近代中国的普遍存在,意味着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无法局部完成,它们的解决必须经过长时间、整体性的建构过程。

近代社会的转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任何试图从单一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的观点无疑都是不全面的。关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的原因分析,无论是仅从内因或是仅从外因的说明亦是很难令人完全信服的。因此,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充分的论证,才能找到科学合理的解释。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毫无疑问是在西方列强的刺激下进行的,即所谓的“外来冲击型”的社会转型模式。尽管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但总体的目标显然是要走近代西方富强国家的老路。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而近代以来中国要在短短一百年时间内完成这样的转变,这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同时,由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以及传统力量在社会中具有突出的优势地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注定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必然带有很强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特征。无论从历史的角度或是现实的角度考量,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都是一

^①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4—265页。

个值得学术界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几年前，我们申请的“中国社会转型研究”课题获得了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专项研究基金的资助。2005年我们课题组的第一个研究成果——《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项研究成果获得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此后课题组的主要人员陈勇博士、田兵权博士和王元琪博士继续坚持对这个课题进行研究，目前已经完成的《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研究》就是对“中国社会转型研究”这个课题的继续和深化。由于社会转型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庞杂，任何试图穷尽所有领域的研究都是徒劳的，因此课题组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采用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以问题为研究的对象，不求研究内容的全面和系统。

对这一课题透彻、全面的研究是一个很难很艰苦的过程，短期内也不可能形成定论。但无论如何，我仍然希望通过课题组的努力，对中国社会转型问题作出自己的解释。

陈国庆

2008年11月18日

目 录

第一章 脱胎于清帝国的中国社会	(1)
一、1911年至1949年中国社会的一般概况	(1)
二、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	(16)
三、中国社会现代化道路的艰难前行	(28)
第二章 金融与财政的现代转型	(36)
一、金融机构、金融体制的现代转型	(37)
二、货币制度的现代转型	(59)
三、财政现代转型的主要表现	(68)
第三章 农村经济的发展演变	(84)
一、利农社会组织与近代农村经济转型	(86)
二、助农社会事宜与农村经济的转型	(104)
第四章 近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变迁	(112)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和研究的理论基础	(112)
二、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军阀统治	(115)
三、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	(120)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	(131)
五、结束语	(145)
第五章 军队与国防的现代转型	(147)
一、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国防近代化建设	(147)
二、民国时期军队的近代化建设	(160)
三、小结	(168)
第六章 城市的现代转型	(171)
一、城市与城市现代化的内涵	(171)
二、影响城市现代转型的主要因素	(175)
三、城市现代转型的主要表现	(187)
第七章 现代社会的阶级与阶层变迁	(197)
一、从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过渡	(197)

二、现代社会阶级与阶层的重构	(200)
三、现代社会阶级与阶层变迁的特征	(219)
第八章 近代人口迁移及社会影响	(224)
一、近代人口迁移概述	(224)
二、近代人口迁移的原因	(229)
三、近代人口迁移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236)
第九章 现代婚姻、家庭与宗族变迁	(244)
一、婚姻制度与婚俗的演变	(244)
二、家庭变革	(259)
三、近代宗族制度的变迁	(269)
第十章 近代社会风俗的变革	
——以妇女放足运动为例	(282)
一、晚清放足运动概述	(285)
二、民国前期(1912—1927)的妇女放足运动	(306)
三、民国后期(1927—1949)的妇女放足运动	(314)
四、结语	(323)
第十一章 科学技术与医药卫生的现代转型	(326)
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326)
二、医疗与卫生的现代转型	(344)
第十二章 传统教育的现代转型	(358)
一、教育转型与社会转型	(358)
二、现代教育的发展概况	(360)
三、现代教育转型的特点	(369)
四、现代教育独立思潮	(370)
第十三章 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	(378)
一、19世纪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一般表现(1895年之前)	(378)
二、清季传统学术的现代萌发	(395)
三、现代学术的整体萌发	(409)
参考文献	(428)
后记	(433)

第一章

脱胎于清帝国的中国社会^①

一、1911年至1949年中国社会的一般概况

无论是从中国的历史发展着眼，还是就中国社会性质的关系变化来说，清末民初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与分水岭。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的政权——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它所打倒的代表封建专制象征的皇帝以及设立的象征着民主性质的总统和议会，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一次极大的解放，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起了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不过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皇帝，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制度，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在中华民国随后的岁月里，由于长时间的战乱（长时间的军阀混战、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再加上部分由于人祸而导致灾情加重的自然灾害，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内外交困、危机重重。而在思想界，除了原有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外，又相继出现或产生了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和本国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同时，随着无产阶级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也应运而生。所以，这一时期的思想家群体和思想流派甚多，思

^① 本文所指的中国社会，从时间跨度上来说始于辛亥革命，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空间范围来看，主要限于中国大陆地区。



想斗争异常激烈^①。总的来说，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战乱严重、自然灾害频繁、政治制度混乱、思想文化错综复杂的社会转型期。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充满了矛盾性。当然，也正是由于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为比较彻底的革命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使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成为可能。

（一）持续不断的战乱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什么比战争带给人类的痛苦与创伤更深重、更惨烈。战争给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带来的破坏性与灾难性，其后果是无法估量的。脱胎于腐朽清帝国的中国社会，对这种灾难的切身体会更加深刻。在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西方列强以其强大武力对中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抢占了中国大片领土，攫取了许多特权和巨额的战争赔款。在他们的支持与策动下，中国国内各派新旧军阀连年混战，长期割据一方。这些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使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战争造成大量社会财富损失和人员伤亡，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失去了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因此，近现代历史上的中国不仅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且还是一个战争不断、民不聊生的国家。

西方列强通过战争手段从中国勒索的巨额战争赔款，使中国政府的财政来源日趋枯竭。据相关资料统计，“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从 1842 年至 1949 年，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历届政府共签订 1175 宗不平等条约、协定、章程和合同。而不平等条约给中国造成最大的压力是赔款。仅 1901 年的庚子赔款一项，就达 4.5 亿两白银。因中国一时无法拿出这笔巨款，只好分期偿还，这样，本息合计赔款总额达到 9.82 亿多两。当时中国的人口是 4.1 余亿，平均每人负担二两多银子。而当时一个劳动力工作一年也不过五六两银子。另据统计，从 1840

^①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民国时期各种思想文化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论述。在他看来，民国时期存在着三种性质不同的思想文化，即：帝国主义文化、半封建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当然，还应包括旧民主主义思想文化和殖民主义思想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兄弟，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而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思想文化，既和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存在着矛盾，又和帝国主义思想文化、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存在着矛盾。民国时期思想文化斗争的尖锐、激烈和错综复杂，实际上是民国时期复杂政治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和反映。参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袖珍版，第 649—658 页。

年开始的战争赔款和从 1894 年至 1937 年支付的利息，就分别达到 13 亿两白银和 7.29 亿美元。”^①

西方列强加给中国的战争赔款统计表^②

1841 年	向威胁广州的英国人支付 600 万两
1842 年	向英国支付 2100 万两
1858 年	向英国支付 400 万两，向法国支付 200 万两
1860 年	支付 1600 万两，其中一半赔给英国，另一半则赔给了法国
1862—1869 年	继传教士和中国居民之间的教案之后，赔款约为 40 万两
1870 年	继天津事件之后赔款 49 万两
1873 年	继日本入侵台湾之后，赔款 50 万两
1878 年	向俄国赔款 900 万两(里瓦几亚条约)
1881 年	向俄罗斯支付 900 万两，这次赔偿使中国重新收复了伊犁河流域的部分领土的主权
1895 年	在中国战败之后赔款日本 2 亿两
1897 年	作为日本军队撤出辽东半岛的代价而赔偿日本 3000 万两
1901 年	向入侵河北的西方联军赔偿 4.5 亿块鹰洋
1922 年	作为撤出山东胶州的代价而赔偿日本 6600 万法郎

战争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破坏程度是无法估量的。辛亥革命以后国内出现的严重政治危机和军阀混战局面，一直持续到全民抗战的爆发，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对此，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颇有感触地说道：“回忆年来，南北战争，兵灾迭见，市厘骚扰，闾阎为墟，盗匪乘隙，纵横靡忌，百业凋残，老弱转徙，人民颠连困苦之情状，怵目恻心。”^③孙中山作为革命家，他对战争所引发的社会混乱、民不聊生情况的认识当为不虚。

据粗略估计，仅从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到 1928 年张学良“东北易帜”，短短 16 年间，在中国发生大大小小的军阀混战就达 140 次之多。每次内战，都给

^① 田克勤：《中国共产党与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3 页。

^② 〔法〕谢和耐著，耿升译：《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08 页。

^③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49 页。



人民带来极大痛苦与伤害，社会财富也在一场场战争之中被消耗殆尽。以至于有人在 1933 年的《申报月刊》中就撰文提出尖锐批评：“再就内战而言，也以民国以来，迄无宁日。（民国）二十二年中，四川战乱四百余次，（民国）十九年之内战尤为惨毒。即举较近者为例，去岁虽曰国难紧急，而内战仍极为热闹，广东有二陈之战，山东有刘韩之战，四川有二刘之战，陕西有杨马之战，贵州有毛王之战。凡此战争，直接间接无不以人民为其牺牲品，乱军所至，鸡犬为罄，炮弹所及，庐墓皆墟。然而中国古朴之人民，二十余年来，惟有长期困顿于水火之中，婉转于铁蹄之下，吞声饮泣敢怒而不敢言。——这样又能算是一个现代国家吗？”^①长达十余年的军阀混战严重消耗了国家的元气，使其无力进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为此后日本对中国的快速侵略扩张埋下了伏笔。

当中国还没有从这些大大小小的内战损伤中恢复过来的时候，一场更大的战争灾难又一次降临到中国人民的头上。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已经开始密谋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实质上就是日本政府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的试探和序幕。1937 年，日本悍然发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这场战争波及大半个中国，把民国以来的刚刚萌发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完全打断，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积累的社会财富大都毁于战火，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杭州、无锡等工业中心城市纷纷沦陷，全国工业重镇和经济发达的精华地区几乎全部遭到严重破坏。农村经济残败不堪，人民流离失所，损失极其惨重。“这场战争使中国经济所受的直接损失当在 100 亿元以上，约合 1936 年国民收入的一半。人员伤亡约 1800 万人，财产损失与战争消耗共计约 4000 亿元以上，折合美金 1800 亿元（按 1952 年币值）。 ”^②可以说这个数字估计非常粗略，其统计结果也比较保守，按照当时战争破坏的实际情况，中国遭受的损失程度可能会更大，以至于有些学者说“日本的侵略使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延误了 20 年时间”^③。

连绵不断的战争，不仅使无数生灵惨遭涂炭，大量财富毁于战火，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而且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百业凋敝，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严

① 杨幸之：《论中国现代化》。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50 页。

② 郑竹园：《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见罗荣渠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26 页。

③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37 页。

重失调,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失去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此外,频繁不断的战争也使国家有限的财政收入被大量用作军费而消耗掉,使政府缺乏足够的资金扩大生产,改善基础设施,发展科技和教育,这也是当时中国经济未能充分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以 1937 年度国家预算为例,军务费占 39.22%,债务费占 32.45%,这两项开支合计占国家总支出的 2/3,而用于建设事业的专款基金与教育支出两项加在一起只占总资本的 11.28%。在 1927 年至 1931 年的四年多时间,南京政府发行的公债、库券额高达 10.06 亿元,比北洋政府 15 年内发行的 6 亿余元公债超出很多,但这些公债主要用于军事开支。”^①

(二) 天灾进一步凸显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的脆弱性

自然灾害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人类社会从诞生以来就一直在同各种各样的灾害作顽强的斗争。中国地域辽阔,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异常复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据统计,“我国自西元(即公元)前 206 年至 1936 年,共 2142 年间有 1031 次水灾,计每百年有 48 年水灾;又在同时期有 1060 年旱灾,计每百年有 49 年旱灾。其实我国历史上水、旱、蝗、雹、风、疫、地震、霜、雪等灾害……即自西历纪元前 206 年至 1936 年,此 2142 年间灾害之总数已达 5150 次,平均约每四个月强即罹灾一次。”^②自然灾害发生率之高,由此可见。甚至到现在,自然灾害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制约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当然,自然灾害同样也是可以采取相应措施预防和避免的,只要政府措施得当、保障有力,社会各相关机构和人民群众万众一心,就完全可以把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社会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由于专制统治的日趋没落,经济发展滞后,再加上帝国主义肆意掠夺,社会动荡不安,使得近现代中国的防灾抗灾能力十分薄弱。于是很小的自然灾害也有可能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中国近代以来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破坏程度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受灾人数如此众多也是少有的。“盖我国灾荒之周期极短,一年一度之巨灾,已为两千年间之常例。但每次巨灾之后,从未有补救之良术,不独致病之弱点未除,且反因每一度巨创之后,元气愈伤,防灾之设备愈废,危机日益

^① 田克勤:《中国共产党与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2 页。

^②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第 51 页。



增剧。在此情形之下，周期之轮环愈速，以前期无数次累积所存之已有之‘病灶’为基础，再度表演，其规模遂更加扩大。”^①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也是中国历史上灾荒最为频繁、最为严重的一个时期。毫无疑问，这样一种频繁而严重的灾荒，必然会给人民群众带来极大劫难，对中国近现代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水灾是带给人们苦难最深重，对社会经济破坏巨大的自然灾害之一。从 19 世纪末叶到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大地上发生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水灾。以中国最大的两条河流长江与黄河为例：1882 年到 1890 年，黄河曾连续 9 年发生漫决，滔滔的黄水始终浸淹着黄河下游数省的广大田地和村庄。进入民国以后，黄河水患愈演愈烈，短短的 38 年间共决口 107 次，而每一次决口，都要淹没大片的土地，冲毁无数的房屋村镇，使大量人口、牲畜惨遭灭顶之灾。1933 年 8 月，黄河中游发生了 20 世纪 30 多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河患，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等省河堤决口数十处，灾区遍及华北 6 省，据统计“被灾人数 3642514 人，死亡人数 18293 人，房屋倒塌 1685369 间，淹没田亩 12742647 亩，牲畜伤害 63639 头，损失 232214648 元”^②。至于 1938 年那场人为制造的惨绝人寰的黄河花园口决口，更使滚滚浊流由豫东泻入皖北、苏北的淮河流域。“此次人为的黄河水灾漫淹 3 省 44 个县市，受灾人口 1250 万，其中 89 万人死亡。”^③长江在 1841—1949 年的一百多年间里“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漂田舍，浸城市，请赈缓征无虚岁，几与河防同患”，仅重大水灾就发生了 9 次，超过了同一时期黄河重大灾害性洪水的次数。诸如淮河、永定河等其他江河流域也是屡屡告急，大灾小灾连年不断。“1931 年夏季，淮河流域也爆发了大洪水，7 月 15 日，蚌埠上下 100 公里的淮河大堤崩溃，大水淹没了 3.2 万平方公里的淮北平原。此次江淮水灾波及 8 个省，受灾人口达 5311 万，其中死亡人口达 422499 人（又据内政部统计，受灾人口 2500 万，直接淹死的人数约为 14 万人）”^④。可以说，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灾害相对频繁和集中的一个时期。

①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第 61 页。

②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第 45—46 页。

③ 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1910—1953 年）》（第六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版，第 585 页。

④ 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1910—1953 年）》（第六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版，第 584—585 页。

近代以降,旱灾的发生同样十分频繁,由于它的影响有个积累的过程,且分布面积广,持续时间长,以致人们一旦觉察到旱灾的威胁时,往往对它措手不及、无可奈何。特别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旱灾的范围不仅在北方地区大为蔓延,还呈现出自西北向东南蔓延、扩张的势头,并出现了不少特大型的灾年或灾害。如光绪初年的华北大旱灾;1920年的西北五省大旱荒;1928—1930年的西北、华北大饥荒;1942—1943年的中原大饥荒和广东大饥荒等等,都是旱魃肆虐的突出表现。其中光绪初年发生的“丁戊奇荒”,从1876年到1879年,旱情整整持续了四年之久,旱区覆盖了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江苏、安徽、四川北部及甘肃东部,受灾总面积超过100余万平方公里,以致出现“赤地万里、路有饿殍”的悲惨情景。“据不完全统计,仅1876年、1877年、1878年三年,北方五省卷入灾荒的州县总数分别为222、402和331个,受天灾袭击的饥民达两亿人,占当时全国总人数的半数,死于饥荒和疫病者1000万左右(也有人估计为900万人、1300万人);从重灾区逃荒外地的人数达到2000万以上。”^①这样骇人听闻的数字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进入民国之后,旱灾更是频繁发生,有时甚至水灾、旱灾在不同地区同时发生。如“1920年,中国北方发生的特大旱灾的地域包括今天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据内务部赈务处统计,此次华北各省受灾县共340个,灾区面积2712700余平方公里,其中京兆区17县,直隶省86县,湖南省77县,山东省21县,山西省64县,陕西省75县。另据内务部赈务处的材料估计,灾民至少3000万人,占各县原有人口总数的3/5。……1928—1930年,陕西、甘肃两省持续遭受了长达三年之久的大旱灾袭击,此次旱灾由于持续时间长,并伴随着传染病的流行,死亡人数远远超过1920年那次旱灾。陕西在三年的灾荒中,死于饥饿及传染病者高达300万人,甘肃死亡人数也高达250万—300万。另外,旱灾也波及了山西、河南、河北、绥远等省”^②。

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连年不断的天灾,受灾区域之广、人数之多、损失之大更属少见。有学者这样认为:“1919—1949年间的中国是一个丧失了任何希望的士气低落的国家,一个使慈悲与公正再没有任何意义的世界,在那里恐惧变成

① 李岚:《近代中国“丁戊奇荒”》,《人民论坛》2007年第22期。

② 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1910—1953年)》(第六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583—584页。



了家常便饭。”^①当灾害发生时，受苦受难的只能是广大老百姓。以下是民国时期关于自然灾害的不完全统计^②：

年 份	灾 别	受 灾 省 份	受灾县数	灾民数
1928	旱灾	冀、鲁、豫、陕、甘、热、察、晋	530	4000 余万
1929			841	
1930			830	5000 余万
1931	水灾	苏、浙、湘、鄂、赣、皖、鲁等八省		4000 余万
1932	水旱等灾	吉、黑、晋、滇、察、赣等七省		
1933	水旱等灾	冀、豫、鲁、赣、湘、浙、甘、陕、川、青、苏、鄂、闽、黔等十五省	436	
1934	旱灾	苏、浙、皖、赣、鄂、豫、甘、黔、晋等 11 省	369	
1935		8 省		2000 余万
1936	水旱等灾		241	
1937	旱灾	川、豫、甘、陕、青、桂、黔等省		

在诸多的自然灾害中，地震也是频繁发生而使人民群众饱受其苦的危害之一。据《中国地震目录》的统计，自夏代有文字可考的公元前 1831 年起至公元 1963 年，我国发生的大于 4.7 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就有 3180 次。进入近代以后，除了个别年份外，在中国大地上几乎每年都有地震发生，地震的强度更是骇人听闻。其中 1879 年甘肃武都大地震，1920 年甘肃海原（今属宁夏）大地震，1927 年甘肃古浪大地震，1931 年新疆富蕴大地震，震级均在里氏 8 级以上，强烈地震带来的灾难是非常剧烈和惨重的。如 1879 年 7 月 1 日，甘肃南部与四川接壤的阶州（今武都）和文县一带发生里氏 8 级地震，地震的波及范围东至西安以东，南达成都以南，方圆将近 2000 里，其中破坏严重或受到影响的有甘肃、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北等地至少 140 余县市，在受灾地区“城堡庙宇官署民房倾坏，伤毙人口甚多”^③。1920 年 12 月 16 日，甘肃海原爆发 8.5 级大地震，“此次地震极其剧烈，持续时间长达十几分钟，严重破坏区的范围包括东起庆阳，南至西和，西至兰州，北达灵武的现宁夏、甘肃、陕西三省的广大区域。据华北救灾协

① [法] 谢和耐著，耿升译：《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13 页。

②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中华书局 1978 年版，第 517—518 页。

③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第 39 页。